

论康拉德《进步前哨》中物化与询唤对主体的影响

王楠, 刘晗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高度物化的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举止和心理变化都受到物的影响。同时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为主体, 使其听从于意识形态话语。约瑟夫·康拉德的《进步前哨》叙述了三个被严重物化的主体对询唤的不同反应: 凯亦兹始终没有觉醒, 最终成为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 卡利尔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的骗局, 但在试图抗拒询唤之际被误杀; 黑人马可拉反而能拒绝询唤, 游离在西方意识形态之外。通过分析物化与询唤对三人的影响,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对人的戕害、主流意识形态的伪善、主体对询唤不同的应答方式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物化; 询唤; 意识形态; 康拉德; 《进步前哨》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2)01-0047-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1.008

Analysis of Reification and Interpellation of Joseph Conrad's *An Outpost of Progress*

WANG Nan, LIU 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a highly-reified society, one's behavior and mentality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commodity. In the meantime, an individual is interpellated as subject by ideology, and then becomes obedient to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n Outpost of Progress* by Joseph Conrad presents how the three highly-reified subjects react differently to interpellation. Devoid of any awareness, Kayerts ends up as a victim to reification and interpellation; Carrier is killed by Kayerts in an incident on the verge of his realizing ideological deception. Makola, the negro, is able to refuse interpellation and drift outside of the colonialism ideology.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reification and interpellation upon the three, this article reveals serious reification and hypocritical ideology of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uncertainties in human being's development.

Keywords: reification; interpellation; ideology; Conrad; *An Outpost of Progress*

一直以来, 约瑟夫·康拉德的《进步前哨》被看作是“《黑暗的心》的注释”^{[1]23}, 受到的关注远远少于后者。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凯亦

兹和卡利尔这两个“完全颠覆了帝国英雄形象”^{[2]153}的、体现出“人性的卑劣、阴暗”^[3]的人物, 把他们当作“被殖民欲望冲昏头脑的欧洲白人”^[4]的代

收稿日期: 2020-07-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18YJA752014)

作者简介: 王楠(1975—), 女, 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小说与当代西方文论。E-mail: wangnan@mail.bnu.edu.cn

表,由此窥见康拉德对帝国主义自诩的“文明使命”的嘲讽和批判^[5],揭开英国殖民主义“进步”话语^[6]的虚伪面纱,但是对另一个人物马可拉关注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进步前哨》做进一步研究,并对较少有人关注的人物马可拉做深入分析。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7]143-144}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询唤”(interpellation),它指的是意识形态对个人打招呼(an act of hailing)^{[8]102}并寻求其回应的行为。本文中“主体”的涵义同样是建立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之上,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尤其是指个人对询唤做出反应之后形成的主体。借助上述理论,本文尝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凯亦兹和卡利尔何以成为愚昧无能的欧洲弃儿?二人有哪些共性和区别?哪些因素导致他们对询唤做出不同回应?在物化和询唤的影响下马可拉有哪些变化和应对策略?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深化对《进步前哨》主题的理解和对物化、询唤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

一、凯亦兹——物化与询唤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

《进步前哨》讲述的是两个白人殖民者在非洲贸易站上的遭遇。为了赚取佣金,两人选择离开他们习惯和依赖的“文明社会”,来到贸易站,在黑人马可拉的帮助下经营象牙生意。卑鄙的马可拉为二人弄到了一大批象牙,但很快他们发现是马可拉通过贩卖黑人换来的,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深了他们的困境。他们所属的贸易公司对他们毫不关心,一连八个月都没有送来生活补给。两个人的性情愈加暴躁,最终因为一点糖块而大打出手,在追打当中,凯亦兹不小心开枪打死了卡利尔。讽刺的是,第二天他们苦苦等待的公司汽船终于到来,凯亦兹听到远处的汽船鸣笛后彻底绝望,他害怕回到国内接受审判,跑到屋外在一个十字架上自杀了。

小说的情节表明由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造

成的物化现象已经渗透到每个角落,并从欧洲蔓延到非洲,影响着每一个人。凯亦兹来到贸易站的目的是要赚钱给他的女儿买嫁妆;卡利尔则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总是去亲戚家里占便宜,他的连襟出于对他的厌恶才帮他在非洲找了个差事。小说还提到了在他们之前来到贸易站并同样丧命于此的一个白人,他“曾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因为倦于空着肚子追求名声,便经过大力荐引,出国到这里来了”^{[1]2}。在被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年代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逃不脱物化的命运。资本主义制度把人性的、有机的一切都异化为无生命的客体,将一切都变成可以量化的“物”,包括感情和机遇等“非理性”因素。所以画家需要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画作进行顶礼膜拜,由画作的商品性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的作品不能转化为商品并且完成交换,他便只能放弃艺术追求,在客死他乡之际无人问津。凯亦兹本是位慈爱的父亲,可是他对女儿的爱只能靠商品和金钱来体现和传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对人的戕害可见一斑。

物化的侵蚀和压迫只是造成凯亦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即使是生活在商品拜物教的统治之下,如果他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可能也不至于去海外殖民地。根据小说描述,凯亦兹在电报局工作了17年,竟然还无力承担女儿的嫁妆。康拉德用“一无是处的庸才”(good-for-nothing-civilian)来形容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凯亦兹是如何落到如此无用和无能的境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他受到的另一重压迫,即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

康拉德在对凯亦兹极尽嘲讽之能事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他和凯亦兹的真实处境,这些精彩描述和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契合度:

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因为稀奇古怪的需要,社会曾经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禁绝了他们所有的独立思想,所有的首创精神,所有的超越常轨的事;是以违者必死的法则禁绝的。他们只能在成为机器的情况下生活。现在,他们从耳朵上架着笔,或袖子上镶金边的人照看孩子似得侍候下解放出来,就像无期徒刑的囚犯在囚禁多年以后获释,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是好。这两个人缺少实际锻炼,不会独立思考,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能力^{[1]5}。

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阿尔都塞提出了“合格”的劳动力的概念:任何一种

社会形态想要长久维持,除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之外,都还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社会培养出的劳动力不仅要具备劳动技能,还要区分出等级,下级自愿臣服于上级,这样才能够保持生产关系的稳定,才算是“合格”的劳动力。所以阿尔都塞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9]325}对于凯亦兹和卡利尔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不会给他们掌握太多技能和知识的机会,这样才能使其成为“合格”的生产力,且没有反抗统治和剥削的能力。所以康拉德说社会“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并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景敞式监狱当中,剥夺他们学习和培养独立生活所需的技能和心智的机会,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底层基础。

《进步前哨》还提到社会对凯亦兹的“照顾”是由“耳朵上架着笔”和“袖子上镶金边”的人完成的,根据常识这两个词组喻指的是工厂(工人和木匠在劳动的时候通常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和军队(英国的部分军装袖子上镶着金边),这两个细节深刻体现出国家机器的运转对个体的影响。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基础上,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前者包括军队、法庭、司法等,必要的时候用武力镇压反抗,维持秩序,但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且效果并不理想,此时就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它通过宗教、文化、传媒、教育等工具,让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心里,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从属阶级行使隐藏的权力,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借助“询唤”来完成,“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8]364}。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比喻成警察,把个体比喻成路上的行人,警察对行人发出呼喊,后者转身回应,这样就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上,意识形态可能把“劳动分工”“各司其职”等观念作为询唤内容,使主体自愿走入意识形态结构当中,接受他们“被指定”^{[8]102}要从事的工作,即给劳动力划分了等级,凯亦兹就是这样被询唤成了底层劳动力。

凯亦兹面对意识形态的询唤始终表现得比较顺

从,倘若不是他这么积极地应答,他和卡利尔可能还不至于丢掉性命。在两个人刚刚来到贸易站上时,公司董事任命他为站长,这是董事作为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对凯亦兹进行的一次询唤。意识形态通过这次询唤完成了“塑造主体之间的位置关系”^[10],即凯亦兹自愿服从董事的命令,同时他也下意识地要求卡利尔服从自己的管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董事面前唯唯诺诺,但是在卡利尔面前却时时不忘保持自己“上级”的身份和尊严。在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把仅剩的十五块糖和半瓶法国白兰地锁了起来。卡利尔最终忍受不了如此艰苦的生存条件,想要喝一杯有糖的咖啡,要求他把糖拿出来,被他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愿打破自己当时立下的“以备患病之需”的戒令。这使得卡利尔气急败坏,露出了杀气。一向软弱的凯亦兹这时候心里已经十分恐惧,但是仍然不能走出公司董事为他制造的“一把手”的幻象,对卡利尔说“我是你的领导”、“我撤你的职”,由此可见凯亦兹在生死关头仍然不能停止对询唤的应答。这样毫无底气的官腔完全激发起了卡利尔暴躁的一面,使他开始疯狂地向凯亦兹发起攻击,最终被对方误杀。小说的结尾有一段描述很值得玩味:“他和芸芸众生——他们是傻瓜一群——一样,一辈子都信奉许多糊涂观念(a believer in a lot of nonsense),然而现在他真的会思想了!大彻大悟了!他内心十分宁静——领略了最高智慧!”^[11]Nonsense 显然是指的是包括殖民主义

“进步”话语在内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这是凯亦兹的自我反省,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是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欺骗的。笔者认为,在分析这段话时应该格外注意康拉德使用的间接引语,也就是说,这段话并非完全是凯亦兹的思想活动,而是叙事者对他的评价,康拉德的讽刺在《进步前哨》这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一段间接引语的语气也是不无嘲讽的。结合语境来看,叙事者所说的“最高智慧”是对凯亦兹此刻的自我开脱的讽刺。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正在把卡利尔定性为“害人的野兽”,并且劝说自己每天都有几十万的人死去,卡利尔这个“卑鄙的东西”死不足惜。在这个细节上,国外学者罗伯特·塔利颇具洞见,他认为康拉德在这里的间接引语和自由引语表现出凯亦兹“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文明塑造他的方式,也因为他是如何在一个远离故乡的空间里塑造了自己”^{[5]12}。也就是说,凯亦兹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主体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的过程,而仅

仅是在杀了人之后的愧疚和恐惧当中,想要拒绝法律意识形态的询问,以减轻自己在心理和法律层面所受的惩罚。然而他没有想到公司的汽船第二天就来了,声声汽笛响彻云霄,每一声对于凯亦兹来说都是意识形态的询问,他感到“社会在呼唤着它的有造诣的孩子回来,照料他,指示他,审判他,定他的罪”^[126]。一向软弱顺从的凯亦兹这才发现没有丝毫的勇气拒绝询问,完全被强大而邪恶的权利机器击垮,只能在十字架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站在上帝视角的读者自然对他的处境有更清晰的认识:凯亦兹是被物化和询问这两股力量逼向了绝境。

二、卡利尔——死于觉醒之际的反叛者

凯亦兹和卡利尔两个人物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康拉德笔下讽刺式的西方文明和殖民主义的代表。他们都是在本国难以生存才来到非洲充当是“贸易和进步的先驱”^[17],都受到了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蒙骗,最终都走向了幻灭和死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两个人在性情、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等方面的明显区别,这些区别导致了卡利尔不同于凯亦兹的思想发展过程,让他先于后者对意识形态的伪善性产生了觉醒意识和拒绝询问的能力。比较这两个人的异同,可以深化对物化现象的揭露,并展示主体对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不同的应对方式,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亟待解决的弊病。

卡利尔和凯亦兹一样出自社会底层,也是平庸无能之辈,同样是怀着对金钱的贪婪与渴望来到贸易站,在新环境里两人都承受着莫大的恐惧和孤独,在苦熬了梦魇般的八个月后就葬身非洲。和凯亦兹一样,卡利尔成长于西方中心话语和殖民主义话语之中,毫无疑问也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询问,被要求做“传播文明的绅士”和服从命令。在当局政府的美化和宣传下,凯亦兹和卡利尔到了非洲之后坚信自己是优质人种,在看到当地黑人的时候嫌弃他们肮脏丑陋,鄙夷他们无知愚昧。后来无意中两人又看到了上一任贸易站站长留下的旧报纸,上面大谈殖民扩张事业的光荣和神圣,这无疑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又一次询问。两人看了以后激动不已,认为自己会给非洲带去文明,会因此名留青史。两个人此时的真实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公司董事早已把他们连同贸易站一起放弃,他们每天都被陌生环境带来的恐惧和焦虑折磨,这时候殖民主义

话语带来的幻想成了他们的止痛剂,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8]352}。凯亦兹和卡利尔的实在生存条件是: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弃儿,他们的无能、愚昧和思想局限终将使他们生活在虚无之中。但是两个人显然没有勇气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这个时候殖民主义“进步”话语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处境,并提供虚假的、想象出来的“表述”,怂恿他们自我美化为崇高的“把光明、信仰和贸易带到地球的黑暗地带来的人”^[18]。他们“开始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一天晚上,卡利尔向四下挥着手说:‘百年之内,这里或许会建起一座城市。码头啦,仓库啦,军营啦,还有——还有——弹子房啦……那时候,小伙子们会读到有两个好样的,凯亦兹和卡利尔,是最初生活在这块地方的文明人!’”^[18]。两个人一直在拼命逃避着现实,此时恰好遇到了意识形态营造出的美好幻象,他们顾不上这幻象的虚假性,一头扎了进去并沉溺其中,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来他们两个发现了马可拉贩卖黑人换取象牙的罪恶行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极度愤怒,大骂马可拉是禽兽,这是因为西方中心话语一向在他们心里制造出“西方/非洲”“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帝国意识形态教导他们要用彬彬有礼的绅士姿态给非洲带去进步与文明,用体面的方式为他们自己赚取佣金,怎么能用奴隶制这种罪恶的方式经营贸易站的生意呢?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拒斥马可拉的行为,这是不自觉地对意识形态询问的回答。奴隶制确实是反人类的无耻罪行,二人反对它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自我美化、愚昧大众的骗局,而卡利尔是两个人中第一个逐渐觉醒,产生反叛能力的。

从小说细节来看,卡利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低于凯亦兹,但是这恰恰成为了识破意识形态欺骗性的一个优势,这个现象貌似矛盾,但实际上可以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找到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替代教会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主要机构,学到更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可能愈加依赖和依恋权威。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描述:“学校……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8]346}在凯亦兹两人刚刚来到贸易站时,公司董事告诉他们这是方圆三百英里以内唯一的贸易站,所以在这里有着“大有可为的前景”,可以靠象牙贸易赚取佣金,

这是一次难得的出人头地的好机会。而叙事者随即就向读者道出了真相:在董事的眼里,这个贸易站其实毫无用处,他心里其实很厌恶和鄙视凯亦兹两人,当然不认为他们能在这里取得什么成就,把他们扔在这里正好让他们自生自灭。凯亦兹作为曾经的电报局的行政人员“知道如何确切地表达思想”,对董事谄媚极尽奉承谄媚之辞;而退役军人卡利尔“对此却感受不深”^[12],并没有像前者那样感激涕零。也就是说,卡利尔找不到适当和准确的语言对董事表示感谢,他也并没有凯亦兹那么强烈的表示感谢的愿望。意识形态和权力是依靠语言来发挥作用的,主体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他们走入象征界(symbolic order)的过程;学会了语言,也就走入了“父之法”为主体指定的位置;主体使用语言的同时也下意识地向权力中心臣服。卡利尔没有像凯亦兹那样完全学会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这让他有了反叛的潜力,为他拒绝询唤埋下了伏笔。

除了文化程度的不同,两人曾经的职业也有区别:凯亦兹是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而卡利尔只是类似于雇佣兵的低等级军人,这些因素都导致卡利尔处在权力结构更边缘的位置,多了几分拒绝意识形态询唤的力量。马可拉贩卖了黑人之后,凯亦兹咒骂奴隶制的邪恶,卡利尔虽然也附和,但是却不如凯亦兹那么坚决。两个人本来商定要把这桩丑事报告给公司董事,请他来定夺,但是卡利尔首先改变了主意并且说服了凯亦兹。他说道:“暗底下做的比这更坏的事他都看到过……相信他吧!要是你泄露秘密,他也不会感谢你。他并不比我好。要是我们紧闭嘴巴,谁会说呢?这里又没有别人。”^[13]如果他们把马可拉贩卖黑人的罪行上报给公司董事,董事就不得不处理马可拉,并没收用黑人换来的象牙,这会导致两人损失一大笔佣金。这时的卡利尔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殖民主义“进步”话语的虚伪性,认识到那些冠冕堂皇地教育他们做“文明人”的人背地里也在做着和马可拉一样的勾当。小说的结尾,卡利尔向凯亦兹索要糖块时称对方为“奴隶贩子”,他心里其实明白自己也同样如此,此时的他已经更坚定地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或者说他自知已经不可能回答询唤。他在完全爆发之际意外死于对方的抢下,没能将他的反抗势头继续下去。卡利尔也是受到严重物化的底层人,赤裸裸的物与物的关系扼杀了他和家人的亲情,为了生存他只能来到非洲。他生活的所有意义已经都变成了收取象

牙,赚取佣金。当他决定隐瞒马可拉的罪恶交易以便留住象牙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沦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就算他没有被凯亦兹误杀,面对他的恐怕仍然是悲剧结局:他虽然看透了意识形态的虚伪,敢于拒绝询唤,但是他却无法抵挡汹涌的物化潮流,因此会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也是另一个人物马可拉面临的困境。

三、马可拉——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危险因素

黑人马可拉在《进步前哨》中所占篇幅很少,但是这个人物有着和两个白人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他的深入研究,首先证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是有可能失效的,个人可以拒绝成为意识形态所招募的主体,或者干脆对询唤充耳不闻,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存在着被推翻的可能,这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潜在危机,也可能是其变革的机遇;其次,马可拉作为一个被殖民者,拒绝成为西方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即伪善的“进步”话语——所询唤成的主体,但是却未能逃脱西方商品拜物教的控制和侵蚀。他游离于“进步”话语之外,同时也沦为商品拜物教的宿主,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将物化和物欲向全世界传播。由于受到严重物化,马可拉完全失去了道德底线,在人类社会中他成为比卡利尔更加危险的因素,预示着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发展方向和文明进程的危机四伏。

马可拉这个人物在英国文学当中是很独特少见的。他是出生在塞拉利昂(Sierre Leone,彼时属英国殖民地)的黑人,但是学习了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精通英语和法语,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受雇于殖民者的贸易站,担任会计。名义上他是两个白人的下属,但实际上是他一手打理着站上的贸易,处处控制着两个白人。他给自己起了个西式的名字亨利·普莱斯(Henry Price),称他的妻子为普莱斯夫人。他平时穿着得体,举止文明,颇具“绅士风度”,但是又经常做假账,中饱私囊。他鄙视白人,对家人慈爱有加,但同时他又参与了黑奴交易,在贩卖自己非洲同胞的时候竟然没有半点犹豫和愧疚,其冷血程度令人咂舌,他的身份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进步前哨》中还提到不少周边部落里的黑人,

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对欧洲文明心存畏惧。马可拉和这些人不同,他显然是放弃了这些土著人的习俗和传统,享受着西方文明带来的便利,并且免于受到白人的任意摆布。但他也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文化对他的塑造,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成长于西方,又或许是因为他早就发现了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都只不过是殖民者攫取利润的幌子,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的询唤进行回答。他不用像两个白人那样要求自己做“有道德的人”和“进步的传播者”,所以他一直肆无忌惮地欺骗别人,保全自己。近几年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人物特点,认为他“虽然严格地遵守文明生活的形式,但他没有受骗和受控于殖民者的文明……他只是吸收和利用,并未区分高低贵贱,也未设置任何界限……他容纳了各种混杂、相互排异的因素”^[12]。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是霍米巴巴的杂交身份和第三空间理论的兴起,马可拉这个人物获得了学界的重视。例如,有国外学者看到了马可拉身上的“挑战白人至上主义的潜质,他在商业交易中完全无视白人的存在,彻底撼动了白人的权威”^[13]。另有国内学者认为马可拉属于一个介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第三空间,它“不是存在于本土与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外的第三者,它所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不仅能为当今的反霸权和反帝国主义带来契机,也是为反对未来新形势的帝国主义做准备”^[12]。以上见解都注意到了马可拉对于殖民主义秩序的反抗性,以及他拒斥意识形态询唤的能力,但又都忽略了他所受到的严重物化以及道德上的堕落,都没有注意到在商品拜物教面前他其实没有多少自主性。马可拉的确是颠覆了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秩序,可是他为了象牙交易而不惜卖掉其他黑人,所以他自己可能成为殖民者的帮凶甚至新的殖民者,这样的人对整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太大的反抗力。从马可拉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康拉德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思考,文中有一个词Fetish深刻体现了康拉德对此产生的矛盾和忧虑:贸易站上有一个仓库,三个人把土著人送来交易的象牙存放其中,然后再从里边拿一些其他货物给土著人作为交换,这个仓库被命名为Fetish,叙事者还不无讽刺地解释了名字的来由:“或许因为它包含着文明的精华”^[17](the spirit of civilization)。对这个词的使用,可见康拉德对非洲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否定。国外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细

节,并且提出了它和非洲拜物教的关系^[14]。拜物教是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之一,与“拜神教”相对。原始社会人们因为科学知识的缺乏,对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于是求助于宗教幻象,把某些物进行神化,看成是掌控人类命运的神,加以崇拜,由此产生了拜物教。在西方文献的叙述中,非洲拜物教又和活人献祭(human sacrifice)紧密联系在一起^{[16]24},并且英国殖民者为制止活人献祭做出了贡献。康拉德在《进步前哨》中也有好几次提到了土著人进行活人献祭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非洲的黑人部落表现出了老子推崇的“小国寡民”的质朴特点,康拉德对这种落后的、远离文明的状态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把非洲土著崇拜的神灵称为“邪恶神灵”(Evil Spirits)。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了Fetish这个词,用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而卢卡契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物化”这个概念。Fetish一词在《进步前哨》当中有着双重意义:既指非洲的荒蛮状态,表现出西方殖民者的歧视与高傲,又指充斥着物化现象、被商品和金钱主宰的西方社会,表现出康拉德作为西方人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当殖民者试图传播文明,对土著人进行教化的时候,又出现了马可拉这样的人,他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西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在本质上的变化却远远超出了西方殖民者的预想,并没有朝着西方人为他设定的方向发展。马可拉在西方文明的干预下摆脱了原始野蛮的非洲拜物教,却又成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牺牲品,同时殖民主义者宣扬的意识形态对他又毫不起作用。凯亦兹和卡利尔一开始尚且能够保持对意识形态询唤的回答,不让自己快速堕落;而马可拉却在做假账、贩卖黑人、在旁观两个白人自相残杀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冷漠和平静。马可拉游刃有余地应对意识形态询唤,玩弄白人于股掌之间,并为此沾沾自喜,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受到的物化和他的道德缺失正在引导他走向毁灭。试想一个为了利益连同胞都能出卖的人,对整个人类社会将会是多么危险的因素。作为一个“国际化叙述者”^[15]康拉德描述描述了自己的非洲见闻,试图引发读者思考,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完成的任务就是让你们倾听、感受,更重要的是让你们看见;没有其他目的,观察就是一切。”^{[16]52}在全球化仍在不断加深的今天,西方社会仍然在向其他地区推行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价值观很可能会催生出更多马可拉这样的人物,这对人类

文明和世界格局的发展都是极其危险的,值得我们警醒。

四、结束语

借助卢卡契的物化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重新阅读《进步前哨》,可以看到三个底层人物在物化和意识形态两种力量的牵扯下,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展示出不一样的主体形塑过程。凯亦兹和卡利尔都挣扎在社会底层,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中被塑造为“合格”的劳动力,愚昧无能且无力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在一个极度物化的、只能用金钱衡量亲情的社会里他们无法生存,被迫离开欧洲,来到殖民地,继而又被殖民主义“进步”话语所蒙骗。由于性格、心理和教育背景上的明显差别,又导致两人面对意识形态询唤的不同反应:凯亦兹始终受着双重压迫但毫不自知,卡利尔曾经觉醒并试图跳出伪善的意识形态之外但未遂。马可拉能够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免于殖民者的伤害,但又成了商品和金钱的忠实信徒,失去了道德底线,这无异于向魔鬼出卖灵魂,对人类社会将会是极其危险的因素。三个人物反映了整个西方文明的顽疾和人类发展进程的潜在危机。

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康拉德. 康拉德小说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 WHITE A. Joseph Conrad and the Adventure Tradition: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Imperial Subjec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陈可培. 康拉德研究的后现代视角——《进步前哨》个案分析[J].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2): 30-33.
- [4] 岳峰. 殖民时代道德拯救与身份认同——康拉德非洲题材小说中丛林形象的解构与重构[J]. 国外文学, 2012 (1): 133-139.
- [5] RUTLEDGE T, Tally R. Formed by place: spatiality, irony, and empire in Conrad's an outpost of progress[J].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 2016 (1): 1-12.
- [6] 殷企平. 《进步前哨》与“进步”话语[J]. 外国文学, 2006 (2): 37-41.
- [7] 卢卡契.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8] KLAGES M. Literary Theory [M]. London: Bloomsbury, 2017.
- [9] 阿尔都塞. 政治与哲学: 阿尔都塞读本[M]. 陈越, 编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10] 陈兴然. 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 97-103.
- [11] 约·康拉德. 文明的前哨[J]. 马小弥, 译. 世界文学, 1984 (4): 174-201.
- [12] 郑凌娟. 发掘康拉德多元的文学空间——解读《文明的前哨中》马可拉的人物身份塑造[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5): 153-158.
- [13] SADEGHZADEGAN M. An ambivalent conrad in an outpost of progress[J]. Selç uk Ü niversitesi Edebiyat Fakültesi Dergisi, 2017 (37): 291-300.
- [14] PIETE W. The spirit of civilization: blood sacrifice and monetary debt[J]. RES: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 1995 (28): 23-38.
- [15] WALKER G. Joseph Conrad: international narrator[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4 (2): 225-236.
- [16] GARNETT D. Conrad's Prefaces to His Works [M].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7.

(编辑: 程爱婕)